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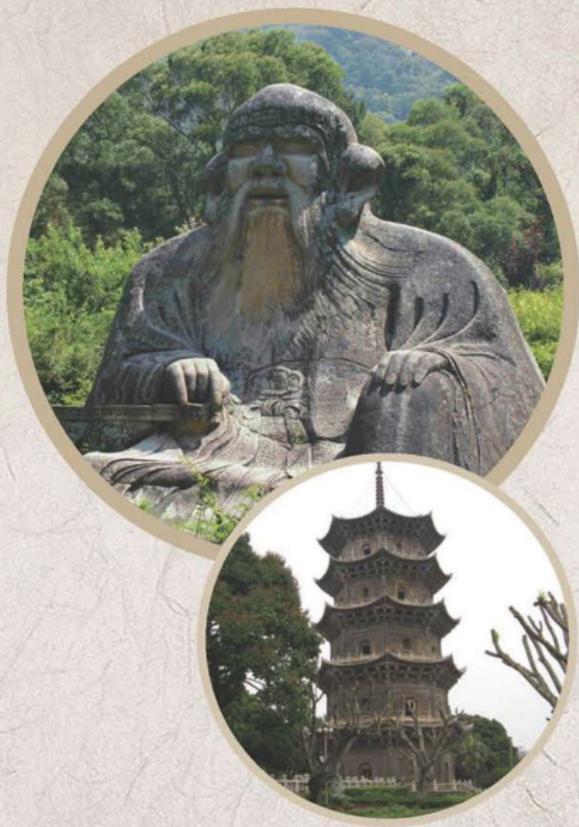
闽台与海丝文化研究丛书 林华东主编

Studies on Translators of Quanzhou Ancestry: *Their Life and Achievements*

# 泉籍翻译家与中西交流

——生平述介与著译考录

郑锦怀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闽台与海丝文化研究丛书 林华东主编

# 泉籍翻译家与中西交流

## ——生平述介与著译考录

郑锦怀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青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籍翻译家与中西交流:生平述介与著译考录 / 郑锦怀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670-1060-4

I. ①泉… II. ①郑… III. ①翻译家—生平事迹—泉州市②翻译—研究 IV. ① K825. 5 ②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665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版人	杨立敏	
网 址	<a href="http://www.ouc-press.com">http://www.ouc-press.com</a>	
电子信箱	1922305382@qq.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传真)	
责任编辑	邵成军	电 话 0532-85902533
装帧设计	汇英文化传媒	
印 制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印 张	14.5	
字 数	270 千	
定 价	28.00 元	

本书承蒙泉州师范学院以下两个基地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基地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闽南文化交流研究基地

林华东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典型文化族群,具有一体多元的特征。汉字的通用和国学经典的认同、和谐共荣的思想和务实进取的特性,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共识。源远流长的历史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包容力、统合力和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4日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就是中华文化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和永恒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闽南文化源于中华文化,是在汉人南下进入福建并吸收当地原住民以及历代不同国家和民族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扩散到台湾及海外其他国家的具有传承性、离散性和世界性特征的亚文化。2009年,我在《光明日报》发文指出,闽南文化的核心精神集中体现为重乡崇祖的思维观、爱拼敢赢的气质观、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和山海交融的行为观。其后,我在《闽南文化: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一书中进一步阐释说,闽南文化蕴涵四种心理意识,即,“原乡情结、祖先崇拜”的族源意识;闽南人具有典型的传承祖先记忆和回报乡梓的文化自觉。“和谐互惠、海纳百川”的兼容意识;闽南人崇尚“你好我也好”的互惠共赢的商贸意愿。“灵活机变、敢为人先”的拓展意识;闽南人拥有山处海行、抢抓机遇的开放性眼光。“坚韧务实、百折不挠”的自强意识;闽南人推崇敢拼敢赢的进取精神。

闽南文化源于中华文化,当下有许多著名学者都在研究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从不同的站位提出中华文化的特征。我觉得,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核心精神可以简洁地概括为“和”、“礼”、“义”、“易”。闽南文化全面弘扬了中华文化这一核心精神。

中华文化以“和”定天下。“和”是中国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治国处世、外事交往的思想标准。天人合一、阴阳和合、

五行和合等,是古代先贤对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做出的提炼。中华文化因“和”而具有强烈的包容力、亲和力和向心力。“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大智慧,适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闽南文化充分展示了和则包容、和则并蓄、和则开明、和则大气的本质。闽南俗谚曰:“相尊食有馐,相争食无份。”(馐:剩余。喻指“尊重礼让能和谐共荣。”)自唐宋以来,闽南人就不断与域外民族交往,容许各种宗教在地生存;坚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实现多民族共荣共生。闽南文化的发源地泉州因之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世界宗教博物馆”和“东亚文化之都”。闽南人海航帆影遍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无论其强弱,从来只谈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不搞强权占领他国土地的勾当;只靠自己的血汗循规劳作,从不以枪炮开路暴取。中华文化的“和”,培育了闽南族群互惠共赢、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

中华文化以“礼”为守则。“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根本。“礼”不仅包含等级制度,还包括孝、慈、敬、顺、仁等道德规范。“礼”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体现,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杠杆。因此,“礼”为适应时代的发展也不断被修正、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治理规则和行为规范。闽南文化继承了礼在崇祖、礼在敬畏、礼在修身、礼在博爱的思想。闽南俗话:“隔壁亲情,礼数照行。”(即:哪怕是邻家的亲戚,礼节也必须照来)闽南人敬畏天道,崇拜诸神,凡神必敬。这是闽南地区泛宗教信仰的本源。闽南人遵守孝道,追忆祖先,坚守“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闽南人坚守文化传承,闽南方言成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南音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宗亲郡望、辈序血缘刻在每一代人的心灵之中。闽南人走遍天下,不忘生身之地,不忘祖籍血脉,充满浓烈的乡情乡族意识。中华文化的“礼”,塑造了闽南族群重乡崇祖爱国爱乡的精神。

中华文化以“义”为修身。“义”者宜也,即“合宜、应该”的意思,强调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观念,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对信义友爱、美好善良的追求。孔子云:“见义不为,无勇也。”“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说文解字》“義”“美”“善”都是羊字头,有内在共同的含义,即美好善良与正直正义。闽南族群具化了中华文化之义存亲情、义存反哺、义存奉献、义存担当的精神。闽南民谚:“德行着好,风水免讨”(“着”:要。即积德行善必有好报。)、“有量才有福”(“量”:肚量。)。闽南人讲究义气,希望“站着像东西塔,躺下像洛阳桥”。闽南人坚守诚信,乐意捐助社会、弘扬正义;闽南俗语“输人不输阵”是对此最好的诠释。闽南人一有成效,就热衷捐资兴学、修桥铺路、扶困解难。中华文化的“义”,成就了闽南族群崇尚信义、乐善好施的品质。

中华文化以“易”为行止。“易”即变易、更新、进步。《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就在于不断革新、不断前进。运用中华文化的智慧创就的汉字儒学、政制律令、科技成就以及中国化的佛教,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曾经辐射整个东亚地区,影响尤为深远。大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细至中国的丝绸茶瓷,都曾经推

动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华文化提倡的革故鼎新、创新创造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经济文明,在18世纪之前一直是全球进步的旗帜。“易”作为中华文化意识与行为的核心内涵,旨在追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旨在励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经劫难未曾覆灭,多逢衰微一再振兴,根脉不绝永续发展,正是把握了“易”的辩证精神。闽南文化充分演绎了易即求生、易即求新、易即求利、易即求先的内涵。闽南族群处于东南一隅,背山面海,为了生存,锻就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行为意识;期盼美好,培育了敢为人先的人格气质。闽南人善于商农并重,勇于乘船走海,敢于守护海疆。隋唐以降,经略海洋长达一千五百多年,开创了宋元时期鼎盛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展示了以闽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许多先民披荆斩棘,与海丝沿线的诸多国家民众共同创业,成就许多伟业,为这些国家的发展、为海丝之路的顺畅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的“易”,锻造了闽南族群山处海行爱拼敢赢的行为意识。

“和”、“礼”、“义”、“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是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认识和处理主客观世界的根本思路;“礼”是道德规范,是“国”与“家”秩序稳定的重要前提;“义”是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追求美好愿景的核心理念;“易”是革新动力,是中华民族创新与进步的关键保证。弘扬中华文化的“和”、“礼”、“义”、“易”,成就了闽南文化今日的辉煌!

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积淀,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是社会长期形成的民风,是时代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引领、培育和涵养人类不断进步的精神食粮!文化需要我们透过表象去阐释、去提炼,并使之获得更好的传承与弘扬。作为中华文化亚文化的闽南文化,几千年来它传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创新了什么,助益了什么,非常需要我们的深入研究和揭示。泉州师范学院同仁们长期关注探索闽南文化的物质具象和精神内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基地和台盟中央闽南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的中坚力量。他们以高度的使命感致力探索闽南族群千百年来的文化足迹,展示闽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从理论高度和实践层面不断提交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我坚信,各位同仁共同努力建设的“闽台与海丝文化研究丛书”,必将为建设海峡两岸文化共同体,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谨以为序!

锦怀撰就《泉籍翻译家与中西交流》一书，邀我作序。我欣然为之。原因有二：

其一，锦怀是个有心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更于2013年当选首届“东亚文化之都”。它素有“海滨邹鲁”之美誉，人杰地灵，涌现了欧阳詹、曾公亮、俞大猷、李贽、郑成功、李光地等一大批历史名人。在中国翻译史上，同样有不少泉籍翻译家为中西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名留青史。此前，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编的《翻译家辞典》（中医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林煌天与贺崇寅主编的《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林本椿主编的《福建翻译家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及我们主编的《福建翻译史论》（古近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均或多或少介绍了若干影响力较大的泉籍翻译家。但是，囿于史料与篇幅，相关介绍仍有改进与提高的余地。与此同时，仍有不少译有所成的泉籍翻译家被忽略、被遗忘。作为一个泉州人，锦怀素对泉州文史深感兴趣。此次，他沿着《福建翻译家研究》与《福建翻译史论》的研究路线，充分利用各种文献渠道，深入挖掘与整理中外文史料，努力向读者呈现作为整体的泉籍翻译家的翻译成就与历史贡献。这既能够帮助八方读者了解泉州作为“东亚文化之都”的文化底蕴，也有利于推动泉州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其二，锦怀是个勤奋的才子。2004年9月至2007年6月，锦怀在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他跟我有缘，选我做他的导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的研究。他放弃了到外校兼课的机会，发奋苦读，学术素养提升得很快。在校期间，他发表了五篇论文，翻译了戴维·米勒的《反对全球平等主义》（载于《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参与由我主编的《世界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还帮我校阅了专著《儒经西传中的翻译与文化意象的变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教材《英汉互译举要》（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与译文集《凯特·肖邦短篇小说选》（因故未能出版）。

硕士毕业之后,锦怀供职于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但仍然与我时有联系。我们合作翻译了英国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伦敦口译员》(*The Mission Song*,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美国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科迪的幻象》(*Visions of Cody*,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年出版)以及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自我肖像》(*Self Portrait*,待出)。

受工作岗位的影响,锦怀对文献学、目录学与史料学等极感兴趣,并逐渐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鉴辨与利用方面展现出不俗的功力。迄今,他已经独立或与人合作撰写了多篇翻译史研究论文,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广西社会科学》、《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权威与核心刊物上,并且协助我主编了《福建翻译史论》三卷,在翻译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他完全有基础与能力写好这本书。

是为序。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系主任

岳峰

2015 年 9 月 18 日

序 章	1
第一节 引 言	1
第二节 翻译史研究的学科属性	2
第三节 翻译史料的分类与所指	4
第四节 翻译史料的搜集、鉴辨、整理与运用	8
第五节 泉州的对外交流与泉籍翻译家的崛起	12
第一章 语言学家、翻译家——周辨明	19
第一节 周辨明生平简介	19
第二节 周辨明的学术成就	22
第三节 周辨明对西方语言学的译介	24
附 周辨明翻译成果一览	25
第二章 传记翻译家——黄嘉历	26
第一节 黄嘉历生平简介	26
第二节 黄嘉历的翻译成就	28
第三节 黄嘉历译《罗斯福传》简析	29
附 黄嘉历翻译成果一览	33
第三章 海明威小说的第一个汉译者——黄嘉谟	35
第一节 黄嘉谟生平简介	35
第二节 黄嘉谟的电影评论与研究	38

第三节 黄嘉谟的剧本与歌词创作·····	39
第四节 黄嘉谟的翻译成就·····	40
第五节 黄嘉谟所译《两个杀人者》翻译史价值评析·····	41
附 黄嘉谟翻译成果一览·····	44
<b>第四章 文学翻译家——黄嘉德·····</b>	<b>46</b>
第一节 黄嘉德生平简介·····	46
第二节 黄嘉德的编辑出版成就·····	50
第三节 黄嘉德的外国文学研究成就·····	51
第四节 黄嘉德的翻译成就·····	53
第五节 黄嘉德的翻译观·····	55
附 黄嘉德翻译成果一览·····	56
<b>第五章 独创“整齐美”译法的译诗名家——林健民·····</b>	<b>70</b>
第一节 林健民生平简介·····	70
第二节 林健民的译作与译评·····	73
第三节 林健民独创的“整齐美”译诗观·····	75
附 林健民翻译成果一览·····	76
<b>第六章 漫画家、出版家、翻译家——黄嘉音·····</b>	<b>78</b>
第一节 黄嘉音生平简介·····	78
第二节 黄嘉音的漫画创作成就·····	80
第三节 黄嘉音的编辑出版成就·····	81
第四节 黄嘉音的翻译成就·····	85
第五节 黄嘉音的翻译观·····	89
附 黄嘉音翻译成果一览·····	90
<b>第七章 生物学翻译家——傅子祯·····</b>	<b>98</b>
第一节 傅子祯生平简介·····	98
第二节 傅子祯的翻译成就·····	100
第三节 傅子祯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102
附 傅子祯翻译成果一览·····	103
<b>第八章 英译《镜花缘》的第一个中国人——曾瑞雯·····</b>	<b>107</b>
第一节 《镜花缘》英译小史·····	107

第二节 曾瑞雯生平简介	109
第三节 曾瑞雯《镜花缘》英文节译版本简介	111
第四节 曾瑞雯《镜花缘》英文节译版本分析	112
附 曾瑞雯翻译成果一览	117
<b>第九章 医生出身的文学翻译家——庄瑞源</b>	<b>118</b>
第一节 庄瑞源生平简介	118
第二节 庄瑞源的文学活动与成就	122
第三节 庄瑞源的翻译成就	125
附 庄瑞源翻译成果一览	128
<b>第十章 菲华诗歌翻译家——施颖洲</b>	<b>130</b>
第一节 施颖洲生平简介	130
第二节 施颖洲的译诗成就	132
第三节 施颖洲的译诗观	134
附 施颖洲翻译成果一览	139
<b>第十一章 经济学翻译家——王友钊</b>	<b>141</b>
第一节 王友钊生平简介	141
第二节 王友钊的经济学成就	145
第三节 王友钊译《计量经济学方法》简析	147
附 王友钊翻译成果一览	150
<b>第十二章 科技情报翻译家——蔡国栋</b>	<b>151</b>
第一节 蔡国栋生平简介	151
第二节 蔡国栋在科技翻译与科技情报方面的成就	154
附 蔡国栋翻译成果一览	156
<b>第十三章 诗人翻译家——余光中</b>	<b>158</b>
第一节 余光中生平简介	158
第二节 余光中的文学成就	161
第三节 余光中的翻译成就	165
第四节 余光中的译论成就	168
附 余光中翻译成果一览	169

第十四章 编辑出身的科普翻译家——吴伯泽	172
第一节 吴伯泽生平简介	172
第二节 吴伯泽的编辑生涯	173
第三节 吴伯泽的科普文章与科幻小说	175
第四节 吴伯泽的科技翻译成就	176
第五节 吴伯泽的翻译观	178
附 吴伯泽翻译成果一览	179
第十五章 美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杨仁敬	182
第一节 杨仁敬生平简介	182
第二节 杨仁敬与海明威研究	184
第三节 杨仁敬的其他美国文学研究成果	186
第四节 杨仁敬的翻译成就	188
附 杨仁敬翻译成果一览	190
附 录 翻译史研究中的 e-考据:作用与局限	194
第一节 引 言	194
第二节 e-考据溯源	195
第三节 e-考据在翻译史研究中的作用	196
第四节 e-考据在翻译史研究中的局限	200
第五节 小 结	201
参考文献	202
后 记	218



## 第一节 引言

当前,翻译史研究(Translation History Study)可谓是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或称翻译研究)之下成果最为丰硕、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翻译史研究并非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翻译学分支学科的身份。

1972年8月21日至26日,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上,长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执教的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著名的主题发言《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翻译学学科分支树。<sup>b</sup>在澳大利亚翻译学家皮姆(Anthony Pym)看来,霍尔姆斯设想中描述翻译学之下的产品导向研究(Product-Oriented DTS)与功能导向研究(Function-Oriented DTS)、理论翻译学之下的特定时代理论研究(Time-Restricted Theories)以及应用翻译学之下的翻译批评研究(Translation Criticism)都与翻译史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sup>c</sup>但是,霍尔姆斯毕竟没有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翻译史研究分支学科。

不过,随着翻译学学科身份逐渐稳固,并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学界对翻译史研究在翻译学学科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中国,有些学者干脆抛弃了霍尔姆斯的翻译学学科分支树,转而认为翻译史研究是跟翻译理论研究

---

a 本章第一至第四节原由郑锦怀与岳峰合撰,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3期,题为《翻译史料问题研究》,收入本书时有所增订。

b 詹姆斯·霍尔姆斯. 翻译学的名与实 [C]// 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201-217.

c Pym, Anthony.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1-2.

和翻译技巧研究并列的翻译学三大分支学科。<sup>a</sup>

对翻译史研究的认识越深,翻译学界对它的兴趣就越大,开展的研究活动也就越多,取得的研究成就自然也越突出。仅以中国翻译界为例,即可略窥其中之一斑。据查,从1880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近70年间,中国仅有5篇翻译史论文正式发表,其中1篇还是译文。<sup>b</sup>而从1984到1998年的短短15年间,中国大陆便出版了13种翻译史专著。<sup>c</sup>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在翻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更为巨大的成就。无论是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2006)、两卷本《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2007),还是六卷本《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2009),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煌煌巨著。

但是,中外学界还很少有人对翻译史研究本身展开细致、深入而成体系的理论探讨。在国外,影响较大的有皮姆所著《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1998)一书。该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翻译史研究者起着很大指导作用。在中国大陆,对翻译史研究的方法与规范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屈指可数,仅有岳峰的《翻译史研究的资讯与视角——以传教士翻译家为案例》(2005)、王建开的《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义与方法》(2007)、许钧与朱玉彬的《中国翻译史研究及其方法初探》(2007)、郑锦怀的《图书资源利用对翻译史研究的重要作用》(2008)、夏天的《史料、语境与理论:文学翻译史研究方法构建》(2012)、黄焰结的《翻译史研究的层次与特征》(2014)、穆雷与欧阳东峰的《史学研究方法对翻译史研究的阐释作用》(2015)等。实践成果的丰富与理论研究的缺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翻译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要求学界必须对翻译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提炼与升华。

## 第二节 翻译史研究的学科属性

对与翻译相关的历史事实进行考察、分析与总结,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认识翻译活动,并进一步建构与发展翻译学。因此,将翻译史研究置于翻译学之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学科领域的本质属性而言,翻译史研究首先涉及的是“史”的范畴,所以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历史学之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少接受过史学专门训练的知名学者,如邹振环、岳峰等人,都或多或少进行着翻译史研究,这无疑是一个旁证。在当代中国,历史学有一个分支叫专门史,其中包含“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向,而这个方向的不少硕博士论文就涉及翻译史个案研究。当代西方汉学家中,也有不少人采用史学方法来研究汉学家与翻译家,如研究理雅各(James Legge)的美国学者费乐仁(Lauren Pfister)等。

顾名思义,翻译史的研究对象是跟翻译相关的各种史实。穆雷对1984—1998年中国大陆出版的13种翻译史著作进行考察,发现其内容涉及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翻译流派、

a 穆雷. 重视译史研究 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J]. 中国翻译, 2000(1): 44.

b 文军. 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6: 2.

c 同①: 44-45.

翻译人物和翻译作品,即译事、译论、译家和译作等,而这些几乎涵盖了翻译史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sup>a</sup> 翻译史实的描述与考察当然离不开对与翻译相关的各种史料的全方位搜集与利用。这就要求学界必须十分重视翻译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古今中外,史料一直都是许多历史学家眼中的关键问题。在西方,19世纪德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十分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辨。他于1824年出版的处女作《拉丁与日耳曼各民族史,1494—1514》中便表现出“对史料来源的重视及深刻的分析”的特点,并认为历史著述是否可信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可信的原始材料作为根据。<sup>b</sup> 以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几乎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达一个世纪之久,其史学思想甚至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自司马迁而降,欧阳修、朱熹、顾炎武等名家都十分注重史料。到了近代,中国历史学界甚至出现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强调史料高于一切。<sup>c</sup> 傅斯年曾经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多年,深受兰克史学观的影响。他于1928年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内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sup>d</sup> 他还在《史料略论》一文中指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并且直接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sup>e</sup> 尽管有不少中国历史学家对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展开批评,但他们大多赞同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比如,翦伯赞虽然认为史料不等于历史,却也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史料……最好的历史学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呢?所以资料是重要的。”<sup>f</sup>

历史研究重视史料问题,翻译史研究自然也不能将翻译史料问题置之不理。但是,中国翻译史研究在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孔慧怡发现:“现有的翻译史倾向于引用的多半是第二、三手资料,同时也颇爱引用名人评语,很少再加考证或思考。”<sup>g</sup> 王建开更是直接指出,史料的挖掘是当前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薄弱点,是中国翻译史研究取得新进展的一个障碍。<sup>h</sup> 因此,学界无疑需要对翻译史研究中的翻译史料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

a 穆雷. 重视译史研究 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J]. 中国翻译,2000(1):45.

b 陈勇,罗通秀. 西方史学思想导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04-106.

c 汤勤福. 中国史学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444.

d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M]//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53.

e 傅斯年. 史料略论[M]//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2.

f 翦伯赞. 史料与史学[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2-13.

g 孔慧怡. 重写翻译史[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12.

h 王建开. 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义与方法[J]. 上海翻译,2007(2):56.

### 第三节 翻译史料的分类与所指

一般认为,史料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史料(primary sources or original authorities,或称原始史料)与间接史料(secondary sources or derivative authorities,或称转手史料)两类。<sup>a</sup>比如,傅斯年指出:“史料在一种意义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sup>b</sup>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 D. Momigliano)也指出:“历史研究的整套近代方法(the whole modern method of historical research),奠基于原始史料与转手史料的划分此疆彼界。”<sup>c</sup>据此,翻译史料可以分为直接翻译史料与间接翻译史料两种。

#### 一、直接翻译史料

傅斯年指出:“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sup>d</sup>莫米利亚诺则认为:“所谓原始史料,为目击者的陈述、文献(documents)以及事实自身的遗存,数者皆与事件同时。”<sup>e</sup>可见,直接史料或原始史料强调的是历史材料的原始性或原初性。就翻译史研究而言,直接翻译史料亦称第一手翻译史料或原始的翻译史料,它能够反映译文或译本最初的真实情况,其可信度与准确性最高。因此,理想的翻译史著述应当都是根据原始的译文或译本撰写而成,以便确保相关史述准确无误。直接翻译史料至少包括以下介绍的五种:

第一种是原始的报刊译文。早期许多翻译作品都是先刊登在各种报刊上,然后才可能被收入某种(译)文集中,或者被编辑成册,推出单行本。不过,译文被转录之时常由于各种原因而会跟其原初状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译者本人对译文进行若干修订,增加译序、译跋等内容;或者编者对译文进行删改,删除译者原序、原刊介绍或原刊编辑小记等内容;或者由于排版与刊印的原因而导致文字错漏等。

试以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汉文诗解》为例。该文最早于1829年5月2日在皇家亚洲文会会议上宣读,后来正式刊登在1830年于伦敦印行的《皇家亚洲文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第二卷上,其题名为《汉文诗解 *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rii. XXI. 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1834年,这篇论文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刷所(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在澳门推出单行本,书名改为《汉文诗解 *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rii. 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From 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 to Which are Added, Translations & Detached Pieces.*》。1870年,阿瑟出版公司(Asher and Co.)在伦敦推出了该书的增补新版(New and Augmented Edition),书名改为《汉文诗解 *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a 杜维运. 史学方法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0.

b 傅斯年. 史料略论 [M]// 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3.

c 同①。

d 同②。

e 同①。